论“静观”与“唐宋互参”之间的理论渊源
——从苏轼到查慎行

张金明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　要］ 苏轼的“静观”论融合了佛禅、道家与儒家思想的多重基因，既重视创作主体与外界隔绝的沉思冥想，又重视主体心灵与外界的感应兴发，两者并存互补，相辅相成。在这方面，苏轼的理论和创作都有出色的表现，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著名诗人查慎行。在查慎行看来，这个“静观”论是超越或沟通唐音宋派的，因而可以作为他所宣扬、倡导的“唐宋互参”诗歌理论的基点之一，从而也使他的诗歌创作典型地体现了清诗折中于唐、宋而偏向于宋的集大成的性质。

［关键词］ “静观”；“唐宋互参”；苏轼；查慎行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 DOI］ 10.15883/j.13-1277/c.20170503705

一、引言

查慎行（1650—1727）原名嗣琏，字夏重，后因故改名慎行，字悔余，号他山，又号查田，晚号初白，浙江海宁人，是清代诗歌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若论在清初宗唐与宗宋诗风演变的进程中，查慎行所做出的贡献与所发挥的作用，较有代表性的当为《四库全书总目》与《晚晴簃诗汇》二家之说。前者云：“明人喜称唐诗，自国朝康熙初年窠臼渐深，往往厌而学宋。然粗直之病亦生焉。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数十年来，固当为慎行屈一指也。”[1]卷一百七十三·集部二十六·别集类二十六《敬业堂集》提要 后者云：“国初诸老渐厌明七子末流科目，至初白乃专取径于香山、东坡、放翁，祧唐祖宋，大畅厥词，为诗派一大转关。”[2]卷五十六 这里所谓的“祧唐祖宋”，有时也称“祧唐祢宋”，可以理解为“远唐近宋”之意，但却决不可理解为“弃唐取宋”之意。实际上，查慎行是采用了以宋救唐、以唐济宋的策略，从而使他的诗歌创作典型地体现了清诗折中于唐、宋而偏向于宋的集大成的性质。对此，查慎行本人亦曾明确宣称：“三唐两宋须互参”[3]正集卷四，《遄归集·吴门喜晤梁药亭》。查慎行一生，皆瓣香心折于苏轼，受其影响之深自不必说，因而他之所以在诗歌创作方面表现为上述特色和倾向，是完全可以从苏轼的影响这一方面寻绎理论渊源的。此非一端，本文即从苏轼的“静观”论这一视角切入，以窥查慎行“唐宋互参”论全豹之一斑。

二、苏轼“静观”论的理论内涵

苏轼的“静观”论是一种融合了佛禅、道家与儒家思想基因的综合性理论，这从他的相关表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一首名为《送参寥师》的诗中，苏轼写道：

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剑头惟一吷，焦谷无新颖。胡为逐吾辈，文字争蔚炳。新诗如玉雪，出语便清警。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

［收稿日期］ 2017-08-28

［作者简介］ 张金明（1972—），河北抚宁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歌、小说及当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

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4]卷十七,905

此诗从“退之论草书”至“谁与发豪猛”一段,是为反驳韩愈《送高闲上人序》[5]中的观点而发。在这篇文章中,韩愈对张旭草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的艺术成就极其赞赏,并认为张旭的草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乃是因为他“有道”。这个“道”表现为,张旭“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而作为僧人的高闲上人,他“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显与张旭不同,故韩愈质疑:“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认为高闲上人“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显然,韩愈所论,侧重于创作主体对于现实世界利害关系的执着以及一种富有唐人色彩的感发激动,而苏轼的“静观”论,则侧重于创作主体对于现实世界利害关系的超越以及一种富于宋人色彩的虚静理智。在这首诗中,苏轼的“静观”论主要体现于“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四句。“空”和“静”是一种佛教禅宗所谓的“禅定”状态,这种状态要求排除一切外在干扰,对外部世界作空心澄虑的静默观照。正是由于排除了一切外在干扰,所以才能够做到“了群动”和“纳万境”。类似的意思苏轼在其他诗文作品中也有表述,如“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4]卷十七,879,《次韵僧潜见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光,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6]1204,《朝辞赴定州论事状》、“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6]340,《上曾丞相书》等即是。另外,“排除一切外在干扰”自然也包括对于现实世界利害关系的超越,并且由此获得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苏轼曾借助两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夫操舟者常患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何则?操舟者身寄于动,而立观者常静故也。奕棋者胜负之形,虽国工有所不尽,而袖手旁观者常尽之。何则?弈者有意于争,而旁观者无心故也。”[6]1204,《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对此,周裕锴先生所作的解读颇惬其意:“由于摆脱与具体事物的利害关系,观照者才能客观地发现事物的真理,发现事物非实用的美之所在。佛教所谓‘观照’,指静观世界而以智慧照见事理,苏轼的观点正是受此启发。”[7]362在苏轼看来,与高闲上人一样同为僧人的参寥之所以能够做到“新诗如玉雪,出语便清警”,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换言之,苏轼认为“空且静”是导致“诗语妙”的重要条件,而不是像韩愈所认为的那样是艺术创作取得进境的障碍。这种蕴含了超功利审美心态的“静观”论,还体现于苏轼的画论中,如《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其一云:

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4]卷二十九,1522

诗中描写画家文与可的创作过程,显然是借用了庄子的理论。诗中“凝神”一语出自《庄子·达生》,里面讲一个痀偻者承蜩技巧极高,自述其道,有云:“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这被文中的孔子总结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8]《庄子》,76 苏轼此诗中的“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即用其意。《庄子·齐物论》写“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并称自己的这种状态为“吾丧我”。[8]《庄子》,5 苏轼此诗中的“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 即用其意。《庄子·齐物论》又写“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 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8]《庄子》,10 苏轼此诗中的“其身与竹化”即用其意。在苏轼看来,文与可经历了“凝神”“丧我”“物化”这样一个创作过程之后,其作品“无穷出清新”固其宜也。此虽是论画,然移之于诗亦无不可。力主“活法”的吕本中受其启发,又借禅宗公案,强调了诗的悟入之旨,阐明了渐修与顿悟的关系,其《童蒙诗训》有云:“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9]594《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则有更详细的发挥:“要之此事(指作诗)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度越诸子。悟入之理,正在功夫勤惰间耳。如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顿悟笔法。如张者专意此事,未尝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

使他人观舞剑,有何干涉。”[9]596清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引吕本中《诗社宗派图序》中语又云:“诗有活法,若灵均自得,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10]吕本中在这里所说的“工夫”(或曰“功夫”)“专意此事,未尝少忘胸中”即大致相当于上引苏轼诗中的“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凝神”“丧我”);“悟入”“顿悟笔法”“遇事有得,遂造神妙”“灵均自得,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即大致相当于上引苏轼诗中的“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总之,这是一个由“渐修”至“顿悟”的过程:“渐修”是必由之路,“顿悟”则是最终结果。另外,又正如萧华荣先生所指出的,吕本中“例举张长史由观舞剑而‘顿悟笔法’,意在说明诗法也可以触类旁通,这就为陆游‘功夫在诗外’之说开启了一个‘悟门’。”[11]192

关于苏轼的“静观”论,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那就是他虽然借鉴、吸收了佛禅与道家的思维方式,但却没有一并接受其空无寂灭的弃世哲学,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性格活跃、热爱生活的人。他以乐观、豁达的态度拥抱生活,因而能够敏锐地感觉到、捕捉到世俗生活和大自然中那些事物的生机盎然、富有情趣,如“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4]卷九,436,《新城道中》写大自然的幽默面目,花草树木的欢快自得,“西崦人家”的田园之乐,“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4]卷七,340,《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写景物的动态,“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4]卷二十六,1401,《惠崇春江晚景》写对季节物候的敏锐感觉,都充满了生命的热情与快乐,是自然与心灵的异质同构。苏轼所谓的“了群动”和“纳万境”,自然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在里面,而这一切,又都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理学家程颢的那首《秋日偶成二首》其二: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12]第二册,P482

诗中流露出来的那种在静穆的观照中个体生命和宇宙生命的和谐交融,以及从万物生机中获得的生命欣悦,无不与苏轼息息相通。周裕锴先生认为,以程颢为代表的一类宋代理学家群体所津津乐道的“静观”,“充满了一种‘生生之谓易’的活泼精神,从大化生机中证悟人的心性。因此,这种‘静观’其实是一种‘活观’,即罗大经所说的‘活处观理’……这种‘活观’的目的就是从大自然充沛的生命创造力中体悟到一种自强不息与和谐自然的精神,也就是《周易·乾卦》所谓‘天行健’的生命哲学意识。这种‘活观’其实和诗人的观物方式完全相通。就其观的方式而言,它注意的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精神,活泼泼的生机。鸢飞鱼跃,草长水流,物之生意与人之灵气相融合,于是,在物我交感的过程中完成了自然与心灵的异质同构,天人合一,道心化为诗心。这是一种充满创造力的艺术思维方式。”[7]365-366

总之,苏轼的这种融合了佛禅、道家与儒家思想基因的“静观”论既重视创作主体与外界隔绝的沉思冥想,又重视主体心灵与外界的感应兴发。在前引苏轼《送参寥师》这首诗中,前者体现为“空”与“静”,后者则体现为“了群动”“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以及“咸酸杂众好”。周裕锴先生认为,“冥想”与“感兴”是“宋人诗思的一体之二面,本是并存而且互补的。冥想因感兴的经验而不至于‘脱空’,感兴亦可借助冥想而得以深化。”[7]376在这方面,苏轼的理论和创作都有出色的表现,并且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性灵派诗人。

三、苏轼的“静观”论对查慎行“唐宋互参”论的影响

由于查慎行对上述苏轼“静观”论的理解、认同与深具会心,他所受的影响也是很深的。查慎行有很多这方面的表述可以佐证,如其诗中有云:“若向此中微领会,诗情原在寂寥间”[3]正集卷十七,《冗寄集·次韵答恺功二首》其一、“唐音宋派何须问,大抵诗情在寂寥”[3]正集卷二十八,《翻经集·得川叠前韵从余问诗法戏答之》、“清浊具本性,澄观得其源”[3]正集卷十九,《酒人集·古诗五章呈吉水大司空李公》其二、“澄观得静趣,含景无停休”[3]正集卷十四,《湓城集·月夜自湖口泛舟还湓城同恒斋太守赋》、“物理与天机,静观皆性情”[3]正集卷二十一,《皖上集·过岸老与之论诗》、“物情闲处得,吾转惜流光”[3]正集卷二十三,《得树楼集·晚景》、“天机昧群动,静者观我生”[3]正集卷二十三,《得树楼集·秋感六首》其一、“入我止观中,万象随起灭。一瓶井华水,眼界琉璃彻”[3]正集卷二十六,《杖家集·瓶中红白莲花》。在这些诗句中,除“静观”外,其他如所谓“寂寥”“澄观”“止观”等也都表达了“静

观”之意。查慎行也像苏轼一样，认为“静观”由于排除了包括现实世界利害关系在内的一切外在干扰，可以获得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并认为这是导致“诗语妙”的重要条件，故他诗中有以上表述。在查慎行的《初白庵诗评》[13]中（注：文中以下凡查慎行评语皆出自此书），他评杜甫《遣意二首》诗其二云：“静中微会，方得其神理。”评苏轼《送参寥师》诗“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二句云：“禅理也，可悟诗境。”评苏轼《舟中夜起》云：“极奇极幻，极远极近，境界俱从静中写出。”评赵师秀《冷泉夜坐》诗“池水夜观深”句有云：“妙句从静中得。”凡此，亦皆是此意。

值得注意的是，查慎行在阐述他所理解的“静观”论时，常常把“静”与“细”关联在一起，如他评杜甫《倦夜》诗云：“静极细极。此段境界，他人百舍不能至也。首尾四十字无一字虚设。五律至此，难矣，蔑以加矣。”评杜甫《题张氏隐居二首》诗其一云：“诗境细静。”评白居易《送兄弟回雪夜》诗“寂寞满炉灰，飘零上阶雪。对雪画寒灰，残灯明复灭。灰死如我心，雪白如我发”六句云：“诗境细静。”评苏轼《虎丘寺》诗“坐见渔樵还，新月溪上影”二句云：“细静。”评苏轼《雨中过舒教授》诗“此生忧患中，一饷安闲处”二句云：“诗境细静，耐人玩味。”又方回《瀛奎律髓》评李虚己《次韵和汝南秀才游净土见寄》诗有云：“三、四（苔破闲阶幽鸟立，草芳深院老僧眠）甚佳。虚己官至工侍，初与曾致尧倡和，致尧谓：‘子之诗工矣，而其音犹哑。’虚己惘然，退而精思，得沈休文浮声切响之说，遂再缀数篇示曾。曾乃骇然叹曰：‘得之矣。’予谓此数语诗家大机括也。工而哑不如不必工而响。潘邠老以句中眼为响字，吕居仁又有字字响、句句响之说，朱文公又以二人晚年诗不皆响责备焉。学者当先去其哑可也，亦在乎抑扬顿挫之间，以意为脉，以格为骨，以字为眼，则尽之。”在《初白庵诗评》中可以看到，查慎行对方回此评有不同意见：“哑、响之义，多读多做自知之，然亦有号为诗家而终身不悟者。细静工夫未讲耳，不尽由于意脉、格骨、字眼也。学者深宜体会。”而应该如何理解“细”的内涵，则需要引述查慎行的一首诗：

得川叠前韵从余问诗法戏答之

唐音宋派何须问，大抵诗情在寂寥。细比老蚕初引绪，健如强弩突回潮。闲来谨候炉中火，众里心防水面瓢。不遇知音弹不得，吾琴经爨尾全焦。[3]正集卷二十八，《翻经集》

从这首诗的题目来看，查慎行明确表示谈的是“诗法”。诗中的“寂寥”即“静观”之意，既曰“唐音宋派何须问，大抵诗情在寂寥”，那就说明在查慎行看来，这个“静观”是超越或沟通唐音宋派的。“细比老蚕初引绪，健如强弩突回潮”这两句所说的由“细”到“健”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本文前面已经提及的，苏轼和吕本中都曾言及的那个由“渐修”至“顿悟”的过程。“细比老蚕初引绪”“闲来谨候炉中火，众里心防水面瓢”“吾琴经爨尾全焦”都是对于“细”的功夫，即“凝神”“丧我”的“渐修”功夫的形象化阐释，而查慎行在另一首诗中所说的“神功须力到，佳境岂意度。人皆信手成，孰肯苦心作”[3]正集卷三十四，《迎銮集·钱玉友有见寄长篇极论作诗之旨一》也指此意。至于“健如强弩突回潮”，则是对于“顿悟”，即前述苏轼所谓“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吕本中所谓“灵均自得，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的另一种形象化阐释。另外，在查慎行的诗歌作品及论诗之语中，我们会感觉到“信手”一词有时是褒义，有时是贬义。这并非查慎行的自相矛盾，因为褒义的“信手”强调的是“捷法”与“活法”，启示诗人以一种透脱的心灵去观照世界，并用同样透脱的语言去表现世界，贬义的“信手”则被用来批评创作态度的轻滑草率，而是否融入了足够的“细”的功夫，则是区分两者的关键所在。

同苏轼一样，查慎行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也对于外部世界有着持久的、新鲜的敏感与好奇，也随时能够发现世俗生活和大自然中那些生机盎然、富有情趣的事物，这就意味着查慎行的“静观”，也是一种本文前面曾经提及的以程颢为代表的一类宋代理学家群体所提倡的“活观”。王英志先生曾经指出：“对于山水诗境的创作，查慎行亦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目存思欲绝，境变奇乃最。’这是要求诗人以虚静的心境、审美的态度，对山水进行审美观照，发现并表现山水景物的动态变化、大自然的生命律动及其所构成的奇美而具有生气的意境。查慎行的许多山水诗正体现了这一追求。”[14]前引查慎行诗句如“含景无停休”“物理与天机”“天机昧群动”等，也都隐含了这些意味。查慎行的大量诗歌作品，则可以让我们很具象地感受到他的“活观”。总之，与其瓣香心折的偶像苏轼一样，查慎行的“静观”论也融合了佛禅、

道家与儒家的思想基因,既重视创作主体与外界隔绝的沉思冥想,又重视主体心灵与外界的感应兴发,并且以他的大量杰作又一次为“静观”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如前文所述,苏轼的理论和创作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性灵派诗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的“静观”论。查慎行则一向被列为“清代性灵派的开山祖”[15],这一点从清诗性灵派领袖袁枚的诸多言论中也可得到佐证。考察宋代两大诗人苏轼和黄庭坚,我们很难不认同缪钺先生的如下结论,“黄(庭坚)之畦径风格,尤为显异,最足以表宋诗之特色,尽宋诗之变态……故论宋诗者,不得不以江西派为主流,而以黄庭坚为宗匠”[16]。苏轼的理论和创作,则先天性地内含了“唐宋互参”的基因,也正因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苏轼弥补了宋诗过于平淡枯瘠的不足。即以前述“静观”论而言,在查慎行看来,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或沟通唐音宋派的。正因如此,推崇性灵的诗人往往呈现出“不唐不宋”或者也可以说是“亦唐亦宋”的面目,如萧华荣先生在论评袁枚时即云:

袁枚在前引《答施兰垞论诗书》中明言自己虽不甚宗唐,但也并不主张宗宋。其实,他颇宗不唐不宋的杨万里(诚斋)。杨万里自江西入而不自江西出,但‘出’后的诗风也不同于唐人,而以富于活泼的灵趣著称。[11]355

显然,杨万里、袁枚在这方面都是典型的例子,而作为“清代性灵派的开山祖”的查慎行,又岂能例外?

关于查慎行之诗歌风格,张仲谋先生有云:

与前一代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下一辈的厉鹗、杭世骏、全祖望相比,查慎行的宋诗气味较淡,那些在苏轼、黄庭坚等人手中已经发展得近乎登峰造极的宋诗特点,在他手中没有继续发展。[17]

对此,笔者亦颇有同感,然而张先生接下来对此所做的解释笔者却难以苟同:

他走的是一条折衷调和之路,不是折衷唐宋,而是把宋诗大范畴中的奇涩劲健与平易晓畅二派调和起来,从而形成他那清真稳惬的艺术风格。[17]

综合本文所论,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查慎行继承和发展了苏轼所提出的包括“静观”论在内的一系列内含了“唐宋互参”基因的诗歌理论,并通过以宋救唐、以唐济宋的方式有效地应用于创作实践,其诗歌创作才典型地体现了清诗折中于唐、宋而偏向于宋的集大成的性质,进而达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的“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1]卷一百七十三·集部二十六·别集类二十六《敬业堂集》提要,以及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所谓的“祧唐祖宋,大畅厥词,为诗派一大转关”[2]卷五十六这样的境界和高度。在这一过程中,如若完全排除折衷唐宋的因素,则笔者窃恐意有未安。

[参考文献]

[1]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 查慎行著,周劭标点.敬业堂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 苏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 韩愈.韩昌黎文集[M].台北:世界书局,2002:284-286.
[6] 苏轼.苏轼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0.
[7] 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8] 老子·庄子·列子[M].长沙:岳麓书社,1989.
[9]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 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M].康熙刻本.
[11] 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2] 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 查慎行撰,张载华辑.初白庵诗评[M].乾隆刻本.
[14] 王英志.查慎行山水诗[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5):2.
[15] 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38.
[16] 缪钺.诗词散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5-36.
[17] 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60.

(下转第 48 页)